

青未了

人文齐鲁

◆口述城事

旧时济南的摇会

□魏敬群

摇会一般由筹款人(即会首、会王、会头)发起,邀请亲朋好友参加(参加者称会脚),比如筹集200元,请10人参加,则每人每月出20元。会首先收第一个月的会款,以后每月按摇骰子方式,决定会脚收款次序。“摇”者,即来源于此。一开始,先进行抓阄,以决定摇骰子的顺序。摇骰子的时候,要备一个平底盆,盆底放四颗或六颗骰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一个小碗反扣上去,然后双手把盆拿起,上下摇动三次,点数大的人得到会款。

摇会一般都确定一个利息额,如每月1元,除会首因是负责组织、服务和信用的人不付利息外,收过会款的会脚下月交钱就不是交20元,而是要交21元了。所以,后面拿到钱的人并不吃亏。摇会亦称做会、聚会、拔社,前面

说到的标会与之略有区别。标会的还本方式是在每月固定会期时,与会者携款前往,各人提出自己的“标子”(即愿出的利率),谁的标子高,就算中标,这月的会款就归他使用。中标者虽获得这笔钱,然已被扣去利息。有些不等钱用的人,便故意把标子出低,让别人中标,等到最后一期“收末会”,反而多得会款,占了便宜。

摇会在过去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融资方式,上至官绅富商,下至贩夫走卒,都有金额大小不一的这类活动。农村则更盛行。至于起自何时,尚难找到答案,不过在清初就已有关于摇会的记载。作成于清朝顺治年间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五回写道:“(汪为露)只因手里有了钱钞,不止于管家,且添了放利,收长落,放钱债,合了人摇会。”作者西周生是明末清初人,故事背景为济南府

摇会是旧时民间互助、融资方式的一种。遇到建房、婚丧或其他要务,当事人一时无力筹集款项时,除了向别人借贷,还可以用“摇会”、“标会”的办法来解决。

绣江县(章丘)明水镇。1927年出版的《济南快览》亦有专门章节记载:“摇会本为储蓄事业之一,亦称‘拔社’。虽各省皆有,然不若济南之盛而方法之异也。”

济南的摇会实际上是标会,“以出息之最多者得款”。摇会“原本为妇孺积金之法。民国十二三年间,商人伙友,互相拔社,而积久弊生,甚至至王潜逃,款项无着,于是警厅禁止拿办。此风稍息,而今尚有行之者矣。”原来,集资骗钱的把戏滥觞于此。

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在济南某企业工作,车间里工友们常组织类似的集资活动,名称不叫摇会,而叫“老婆会”、“老母猪会”。笔者也亲身参加过一次,集资额为100元,10人参加,每人每月出10元。那时,青工的工资都是30多元,生活不富裕,往外拿10元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而100元的会款也可

以解决比较大的问题。自行车(永久、凤凰牌)、手表(上海牌)、缝纫机(蝴蝶牌)这“三大件”价格都是100多元,添点儿钱就可以买到一件了。年轻人谁不盼着骑自行车,戴上手表呢。记得我们是抓阄决定用款次序的。有两位工友没参加抓阄,一位是发起人,他第一个使用会款;另一位家境较好,主动排在最后。中间,一位工友急等使钱还与他人调换了顺序。工友之间,什么都好商量,大家互相体谅,没有人算计吃亏沾光。这样,每到发工资的日子,会首便忙碌起来,到处找人,会脚们自然会掏出10元钱交给会首,由会首按既定顺序转交用款人。

除了摇会,车间里还有互助金会,每个职工只需拿出3元钱,便可在发生临时困难时,享受短期借款的便利。在那个年代,毕竟更需要同志之间的温暖。

民间饮食

对夹与油旋

□王旭东

来到内蒙古赤峰半年多了,这里的小吃对夹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睹物生情,每次吃对夹,都不由自主地想起家乡的名吃——济南油旋。这两种小吃吃起来都是外酥里嫩,特别讲究和面的技术;而且也都是为适合当地人口味,在原有的一种食品上改良创新出来的产物,差不多都传承百年了。

相传,对夹是上世纪初到赤峰做买卖的苏文玉、苏德标父子受河北老家驴肉火烧的启发,以赤峰“哈达火烧”为模板,辅以宫廷传统熏肉工艺整合创新而成。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赤峰对夹的制作有一套特殊的工序。做对夹皮,最讲究和面技术。一边是油和面,另一边是水和面,然后把两样面揉在一起,用擀面杖将面擀成大片,抹上油酥,卷成卷子,揪成剂子,做成圆饼,上吊炉微烤。做对夹肉,上好的肉用老汤煮熟,精选十几种配料调味,出锅淋干,进行熏制。据说,赤峰第一家对夹铺——复生隆所创造的熏制方法更是别具一格,是用锅熬红糖冒出的热气熏烤猪肉,使之色泽诱人、香甜可口。最后,用刀从烤好的对夹皮侧面切开,把熏肉切小片塞进皮中,放入烤架(早期是摆到一种铁制叉子上),用炭火烤透,香喷喷的对夹就新鲜出炉了。

如今,对夹已成为赤峰老百姓早餐必备食品,大街小巷叫卖对夹的店家很多,但尤其以赤峰城南对夹最为有名。南来北往到赤峰的人都不忘品尝对夹,甚至临走时都要带上一一些赤峰对夹回去。

济南油旋形如旋涡,色泽金黄油亮,也是外酥里嫩,只不过没有夹肉,而是葱香扑鼻。相传,油旋是在清末年间,齐河县徐氏三兄弟一起去南京闯荡时学会了做油旋的手艺。他们回到家乡后,在济南也开了一家油旋店。与苏氏父子创新对夹特别相似的是,徐氏兄弟根据北方人口重和喜葱蒜的特点,对这一南方小吃进行了改良,加入盐和葱油,变甜香为咸香,更加适应山东人的口味。一时间,生意兴隆,门庭若市,颇受众生热捧,这为油旋在济南的百年流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做油旋也不简单,细算下来,需要十几道工序。用擀面杖把剂子擀成长圆形后,要不停摔打,使面皮更长一些。接着把花生油、细盐和猪油与葱花拌制的葱油涂抹在面皮上,再把面皮卷成一个螺旋形的圆柱体。先把这些圆柱体放在刷油的案子烙,等一面微微泛黄后,把这圆柱体按扁翻面,刷上油再烙3分钟,油旋就会慢慢鼓起,这时放进炉里烤制4分钟,就可以出锅品尝了。刚出锅的油旋色泽金黄油亮,层层饼旋薄如羽翼,外脆酥里绵软,油香扑鼻。

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季羡林最爱吃济南油旋。季老6岁从山东临清到济南投奔叔父,并在济南读私塾,小学和中学的济南生活,特别是济南特色小吃油旋给季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济南的学生去看他,都少不了带上特意定做做的油旋。季老对于家乡的小吃非常满意,还专门给做油旋的张姓店家题字:“软酥香,油旋张”。

我想,不远的将来,赤峰对夹也许会“南下”,济南油旋也能够“北上”,济南人一定会喜欢赤峰的对夹,而那里的人也一定会喜欢济南的油旋。



招香绳

□马洪利

招“香绳”就是拧“栗花绳”,也叫招“礼花绳”或拧“火绳”。招“香绳”就是把香气浓郁的板栗花编织成“花绳子”,晒干点燃后烟气芬芳,清香扑鼻,不仅有净化空气的作用,而且还有驱蚊赶蝇的奇效。图为济南市长清区武家庄年过八旬的刘庆英老人正在拧“栗花绳”(招“香绳”)。



◆忆海拾珠

我的大舅王苇塘



大舅读师范时,目睹当时的官吏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心中极其不平,愤然改名叫王囚(原名王绍曾)。这样一位有家财、有一定事业前途的年轻人,却自比囚徒,其当时的心境可想而知。

□殷京生

1996年新版《济南年鉴》中有这样一条内容:“王苇塘(1906.9~1996.6)男,原济南市教育局顾问。山东省博兴县人。193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1983年3月离职休养,享受地市级待遇。1996年6月28日病逝。”

王苇塘是我的大舅。时至今日,大舅逝去十五年了,总想写写他老人家,但总是不好落笔。说他平凡,他的一生却也不乏传奇。他1930年毕业于革命色彩很浓的济南第一师范学校,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了著名的博兴八四暴动。他曾两遭国民党逮捕,一度流亡北京。“文革”之初,他是和邓拓、吴晗、廖沫沙同时被揪出的中国最早的一批“黑帮”。以六十岁高龄被揪斗,被凌辱,居然完好无损地挺过了十年,又做了数年市政协常委、教育局顾问,离休后,又安安稳稳地生活了十几年,直到九十岁去世。如此,还不算传奇?说他一生多么光耀,却也远远谈不上。老人家幼读私塾,既长上小学、中学、师范,一辈子未离教育圈。抗战时,他做过垦利区著名的耀南中学校长。解放战争时,任渤海干校大队长。建国后,当过山东医学院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校长、济南一中校长。当然,这期间也做过科长、处长、参议员,甚至任过军职,但为时很短。总其一生离不开“教书匠”三个字。

教师在20世纪30年代初似乎是个很不错的职业。大舅对我说过,1931年,他应聘回到博兴当小学教员,月薪是24块银圆。他和另一教员一人出资5元,雇一厨师,连工带料一包到底,一日三餐皆为白面卷子烧牛肉。大舅当时虽已成家,但并无家室之累。姥姥家是拥有60多亩耕地的殷实人家。

这样一个家资不菲、职业高尚、生活优裕的“少爷”,当年怎么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呢?据博兴县党史文献记载,大舅当时受到周围一些共产党人影响,读过一些马列著作,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我觉得,他性格中两点最突出的成分——正直和质朴,是决定因素。听母亲讲,大舅小时,有一次看到两只狗打架,一只强狗欺负一只弱狗,当时竟抄起菜刀刺了强狗一刀。此举让家里老人吃惊不小,年不及弱冠的读书郎,竟如此凶悍,将来还了得?于是姥爷和五姥爷合力将大舅捆起来一顿暴打,说是要“杀杀他的凶气”。

大舅读师范时,目睹当时的官吏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心中愤其不平,愤然改名叫王囚(原名王绍曾)。这样一位有家财、有一定事业前途的年轻人,却自比囚徒,其当时的心境可想而知。

1976年1月,我陪母亲去济南看望大舅,其时大舅刚刚恢复组织生活,尚未恢复职务,在学校图书馆管理图书。没想到,我们竟在图书馆门口见到了他老人

家。远远地,他踩着积雪朝我们走来。他的头发全都灰白了,身上是一套略显臃肿的黑棉衣,脚上穿一双山东农民冬天常穿的那种蒲草编的“蒲窝子”。他的双手插在袖子里,步态有些龙钟。“这是京生吗?”大舅笑着问,还是小时见他时那样慈祥。母亲哭了,说:“哥,你可遭罪了。”大舅笑着说:“过去了,都过去了。”

我们一边吃着从食堂打回的饭,一边聊着家常。大舅对当时的生活好像十分知足,他开朗地说:“只要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只要有书看,别的我什么都不需要。”母亲问:“工资给你补发了吗?”大舅说:“补发了,都交了党费啦。”数千元工资竟然都交了党费,母亲颇不以为然,说:“森和存(我的两位表姐)孩子小,生活都很困难呢。”大舅淡淡地说:“他们都有工资,困难什么。”

大舅一生教书,对年轻学子仿佛有一种源自天性的父爱。他年轻时家境好,自己薪水也不低,但是他仍然两袖萧然。听母亲说,大舅的钱常常接济那些书读得好但家境贫寒的学生或一起革命的朋友。我在互联网上读到过一篇书评,是对大舅一位学生新著的评论,文章题为《中国人的心灵鸡汤——读孟嘉先生新著〈温暖与悲凉〉》。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讲到了大舅,“在M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的青年吕家乡(即孟嘉先生),凭着单纯的政治热情和爱国情感‘大鸣大放’而落入‘阳谋’圈

套的时候,王苇塘校长那些不露痕迹却又切切实实关爱的言行,体现出人间真情和知识分子的正直人格……”很遗憾,我没有找到《温暖与悲凉》这本书,因此无法具体了解大舅究竟怎样切切实实关爱这位单纯的年轻学子,但是我可以体会大舅为国家怜惜人才的焦虑性情。

实际上,我和大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大舅的音容笑貌总是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无法忘记老人曾经很认真地给我讲解几种文言虚词的用法;无法忘记老人很认真地纠正我看到的一本书上“清代诗人王士禛是博兴人”的说法,他严肃地告诉我:“王士禛,号渔阳山人,山东桓台人。桓台古称新城。”我也无法忘记有一次陪老人家逛中山公园,过来雨轩,曾问他:“来今雨轩四个字出自何典?”老人的笑容里有一丝惭愧,甚至有一丝难为情,但还是很认真地回答我:“不知道。”

大舅临去世前一年,已经有了老年性痴呆的症候,即使犯糊涂的时候,心心念念,也还是他的学生。有一次,二表哥下班回家,进屋就看见大舅正颤巍巍地往暖气片上搭着棉被。二表哥忙问:“爸,您这是干嘛?”大舅回过头看着二表哥,浑浊的老眼中全是焦急:“要开学啦,学生们就要回来啦,被子还是湿的呢。”

这就是我的大舅王苇塘。